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

编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

第三辑

□主 编

袁 仲 一

张 文 立

张 新 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

第三辑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编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

主 编 袁仲一
张文立
张新科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

第三辑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 编

主 编 袁仲一 张文立 张新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美术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875 印张 6 插页 500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4-04147-5/K·653

定价:32.80 元

目 录

纪念司马迁诞辰 214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袁仲一(1)
纪念司马迁诞辰 214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赵光勇(4)
司马迁开放观探微	宋嗣廉(9)
谈谈司马迁的义利观	施 丁(24)
货殖与礼义——《史记·货殖列传》析论	阮芝生(40)
班氏论迁论	张文立(57)
《史记》所表现的社会结构及人的主体性思想	杨燕起(74)
试论司马迁人本主义历史观	崔康柱(89)
试论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	张晓明(106)
论司马迁道德价值观的基本特征	王成军(119)
“人性各有所修短”——关于《史记》列传中的人性主题	周先民(133)
论《史记》的礼治思想——兼论“乐”与“仁”及大一统观	郭伟川(151)
论《史记》的治国思想	马雅琴(170)
关于《史记》的编次——特别是关于《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	
分别置于“世家”、“列传”第一篇的意味	〔日〕今鹰 真(187)

《史记》中纪年资料的利用——司马迁的历史思想

.....	〔日〕藤田胜久(198)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新论,	俞樟华 梅新林(212)
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田 静(235)
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命运哲理.....	陈兰村(249)
司马迁的法家思想与《史记·商君列传》.....	徐卫民(263)
司马迁尊儒倾向.....	李淑萍 孟剑明(274)
司马迁的复仇观.....	张 宁(286)
千古文章爱才情——司马迁的人才观与士人的悲剧.....	高巨成(297)
《史记》与民族文化精神.....	陈桐生(312)
汉朝百年间的史学与政治.....	王培华(326)
论《封禅书》对原始道教文化起源的实录.....	张 强(349)
从《史记·平准书》看司马迁写当代史.....	叶幼明(366)
《史记》中的建筑思想初探.....	赵安启(381)
司马迁对“天学”的杰出贡献.....	王双怀 马家骏(395)
试论《史记》中辩士的分布规律及原因.....	贾俊侠(411)
浅谈司马迁对汉武帝伐大宛的认识.....	池万兴(422)
司马迁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	吕培成(433)
清人论“班马异同”.....	朱思红(447)
《论语》论《诗》与《史记》论《诗》.....	张家英(454)
也谈《史记》“太史公曰”——与《〈史记〉“太史公曰”质疑》 一文作者商榷.....	张新科(465)
难得一笑寓意深——读《史记·滑稽列传》.....	田长山(478)
司马迁史学地位论辨.....	毛 曦(483)
《三国史记》与《史记》.....	陈蒲清(493)

司马贞的史学思想——关于《史记索隐》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日]青木五郎(500)
《史记正义》佚文考释.....	田大宪(516)
《史记正义》单本何时传入日本.....	[日]小泽贤二(538)
从书体演变角度论《索隐》《正义》的十岁之差 ——兼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说补证	袁传璋(541)
苏秦事迹之真伪.....	牛鸿恩(558)
司马迁所见《孙子兵法》《新语》考.....	赵生群(590)
《史记·货殖列传》南阳部分诠释.....	侯甬坚(598)
从《史记》考证韩城春秋战国的历史.....	任喜来(605)
《史记》勘误十五则.....	梁建邦(613)
一百年《史记》西洋翻译(1895—1995).....	[美]倪豪士(628)
《史记》在韩国的译介与研究.....	[韩]诸海星(635)
《史记》研究方法论管见.....	齐效斌(650)
后记.....	(662)

纪念司马迁诞辰 2140 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      袁仲一

各位代表、各位先生：

炎夏初过，金秋送爽。我们汇集在古城西安，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中国古代的文化巨匠司马迁诞辰 2140 周年。这是一次研讨《史记》与司马迁的学术盛会，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长河中，将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会议。首先，我代表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对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和学者表示由衷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两千一百多年前，正当中国古代西汉帝国的全盛时期，“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一颗文化巨星诞生在中国的黄河之滨。司马迁生于夏阳，以后长期工作与生活在西汉首都长安，而且足迹遍历神州大地的大河上下，江淮之间，巴蜀梁楚，塞外岭南，考核金匱石室玉版，搜集天下放失旧闻。虽在极端困厄之中，仍然

以天下为己任，继承父志，发愤著书，完成了中国第一部通史性的伟大著作——《史记》。他要通过这部著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在《史记》中集中地总结了中国远古至汉代的历史和文化成就，留给了中国和世界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与日月并辉，与历史同存。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的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外文化研究者的不了“情结”。中国从汉代以后直到现在，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学者成百累千，著作山积。《史记》流传到国外以后，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重视。到现在，可以说对《史记》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世界五大洲了。对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对司马迁的研究不仅有对其生平的研究，而且有对他的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科学思想的研究及其对世界文化贡献的研究。对《史记》的研究，除过对《史记》的体例、校刊、考证、订补、注释、翻译外，更具体地对《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的研究。总的来说，无论是对司马迁还是对《史记》都展开了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多视角的多元研究。在研究中，中国和国外的学者，在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相互探索和相互支持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对这些中外学者们表示由衷的钦佩和尊敬，并祝愿他们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这次我们召开的纪念司马迁诞辰 2140 周年学术研讨会，意在纪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的时候，进一步加强世界上研究司马迁的学者的团结和学术交流，推动全球对司马迁研究的继续和深入。

这次应邀来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学者，还有日本、韩国、美国的学者；有在世界上久负盛名的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耆宿，也有近年来卓有建树的英才。这说明，司马迁不朽，司马迁研究队伍在扩大，题材更广泛。我热诚地祝贺各



位专家在会议中广泛交流研究成果，广交朋友。交流学术成果，学界朋友团结，加深学界情谊，是我们的宗旨。

会议期间，除了交流学术成果外，我们还要组织与会的先生们进行学术考察和参观，使大家对古都西安的悠久文化，作一些了解；有的先生还要亲赴司马迁的故乡韩城作学术考察和交流，亲身体会钟灵毓秀的龙门风光。

我祝愿各位先生在会议的学术交流及参观考察中取得成功，尽兴满意。

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各位先生。

# 纪念司马迁诞辰 2140 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 赵光勇

各位先生、各位代表：

纪念司马迁诞辰 214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经过四天的紧张活动，今天就要结束了。我代表大会主席团，向各位先生、各位代表几天来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共 110 位，有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有和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国的学者，有和我们唇齿相依的韩国学者，有我们的邻邦新加坡的学者，还有我国的宝岛台湾及香港的学者；中国大陆的学者来自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会议收到专家和学者的论文共 106 篇。从代表的分布及论文的质量和数量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次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国际盛会，它将载入司马迁和《史记》研究的史册。

来自世界各地及中国的学者，有年龄高达 86 岁的学者，也有

20多岁的莘莘学子，有对司马迁及《史记》研究有素的学界前辈，也有初窥门径的年轻学人，大家在发言中都有一个共识，即司马迁这位文化巨人的出现，不但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东方的骄傲。他的精神和著作，已经汇入了人类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学习司马迁，研究《史记》，弘扬司马迁精神，推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不断深入，成为与会者的共同心声。这便是我们对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最有意义的纪念。

这次大会在大会主席团的具体领导下，开得是成功的，这主要表现是：学术空气浓厚，交流了学术信息，拓宽了研究领域，锻炼了青年学人。

学术会议主要活动必须突出学术。我们根据这一原则，对会议活动进行安排。四天会议中，有一天为小组讨论，与会代表90%以上，都在小组会上交流了论文和学术信息，有的专家还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推荐了大会学术发言的人选，有27位学者在大会学术交流中发言。其中日本、韩国、美国的学者7位，中国学者20位。这些学者中，不但有国内外久享盛誉的专家，也有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学者，还有初历学术殿堂的青年。无论是大会还是小会，学者们对一些问题，都展开了热烈的争鸣，气氛热烈态度诚恳，使争论双方，都受到了不同教益。结合学术讨论，代表们还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华清池、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考察，对周秦汉唐的文物及遗址，从感性上增强了了解，有些文物或遗址，对《史记》的某些篇章，具有印证或补充的意义。

代表们在大小会议上的发言及提交的论文，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从多方面提供了学术信息。日本、美国、韩国学者在发言中，都介绍了本国对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出版、宣

料收集、主要学者、代表性的著作，提供了美、法、俄等国对《史记》的研究和翻译情况及《史记》传入本国的信息。中国的学者介绍了近年来中国在《史记》研究方面的动态，包括学术团体、学者、著述、新的资料、正在编写中的论著，如《史记注译》、《史记学大辞典》、《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史记研究集成》等。这样，进一步增强了各国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沟通了世界上的研究信息，对各国的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对各位学者今后的研究工作，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从大会小会发言及学者们提交的论文看，学界对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一是新方法的提出，二是新领域的开拓，三是对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新的研究方法中，比如从书体流变的角度，研究司马迁的生年；从《史记》的编次，研究司马迁的治史思想；从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的二重证法，考察《史记》苏秦事迹的真伪；中西比较的方法，将司马迁与修昔底德斯比较，观察其在世界史学中的地位等。有些方法虽然前代学者已经提出来了，但他们把这些方法引进到《史记》的研究上来，作出了新的成绩，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开拓《史记》及司马迁研究的新领域，是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一大特点。从这次会议及论文中反映的来看，学者们从多方位、多视角、多层次的方面，在不少的领域中，伸出了探索的笔触，比如语言学、民族史、军事思想、建筑思想、神秘文化、因果报应、地学思想、开放观、科技思想等领域都有文章发表。有的学者还通过对《史记》的研究，拓展到对“三家注”及其作者的研究，如对司马贞思想的研究；对《史记》结构与构思的研究，提出了司马迁的“物盛而衰”为中心的史观；有的学者在论述了《史记》研究的概况后，提出了“史记学”的意见等。这些研究，对进一步开拓司马迁与《史记》的多方位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对过去已经提出的观点，不少学者在论述中，引入了新意。例如，关于司马迁的天人观，有的学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出发，认为司马迁的天人观和与其相连的神秘思维给《史记》蒙上了不算太淡的神秘色彩；关于司马迁尊儒倾向，除了谈到他的尊儒外，并分析了他对儒家思想的扬弃及思想情感、社会因素；关于司马迁的性格与人格，也是近年论述较多的，这次学者们从这一主题出发，又提出了他的悲剧心理、忧患意识、侠义精神、怀疑精神、复仇观等；关于班、马异同也是过去学者们谈过的问题，这次则有学者从分析异同出发，提出了班、马是两位可以垂名永远的文化名人，各代表了一个史学群体的意见；关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反映的义利观，学者近年来曾着力探索，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对司马迁的义作了更深入的具体分析，提出了义利观中包含着王侯之义与游侠之义等思想。这些研究，给已有的观点、研究命题，注入了新的活力，增强了新的内容和含义。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青年学者的比例显著增强。他们在会上除了发表自己的论文外，还虚心的向前辈学者学习，学习新知识，学习研究方法，对他们今后的提高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总之，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这就是：研究的队伍扩大了，研究的水平提高了，研究的内容更广泛，研究的方法更多样，研究成果更显著。我希望有志于从事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同志，继续努力，开拓奋进，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中，作出更大成绩，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让司马迁的伟大精神与不朽著作，更加发扬光大。

这次会议前夕，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与日本名古屋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会合出了一本论文集，这是中日学者的第一次合作研究的成果。会议中，纪念司马迁诞辰 2140 周年书画展与会议同时进

行，司马迁研究资料中心成立，这些为纪念活动增色不少。我们都表示感谢。今天会议结束以后，还有许多代表和先生要到司马迁的故里韩城进行学术考察和学术交流，我祝他们的考察和交流取得圆满成功，并祝他们一路顺利。

各位代表，各位先生：

君子以文会友。我们相聚的时间很短，但由此结下的学术情谊，将长久地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仍互道学术信息，交流学术成果，以新成果在下次会上相见。

最后，我代表全体与会代表，向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付出了人力、物力的主办、协办单位，向陕西师大的领导和同志，向为会议服务付出了艰辛劳动的会议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现在，我宣布：

纪念司马迁诞辰 214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胜利闭幕。

祝代表一路平安。

司马迁开放观探微

~~~~~

吉林师范学院

宋嗣康

封闭，长期以来几乎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代名词。然而笔者最近重读“通古今之变”的《史记》，觉得中国古代社会不能简单的用“封闭”一词以偏概全。古代中国社会还有开放的一面。认真总结不同历史时期自觉、不自觉、主动、被动“开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我们今天如何正确对待和执行党的开放路线，是会有借鉴意义的。

古人云：“国于大地，必有与立”。古今中外，一个国家从来没有孤立地存在于世上，多国并立，不是兼并，就是共处；不论是兼并还是共处，都有个“开放”的问题。《史记》则实录了从黄帝到汉武时期诸侯国之间、宗主国与藩属国、中国与外国之间相互联系交往合作的历史。要联系、交往、合作就必须开放。黄帝所号令的侯主“国”实际就是部落。到了夏、商时代，逐步形成了分封制，这种制度又为周所继承。周朝时中原华夏地区不叫“国”，叫“天下”，周王即“天下共主”，而那时的“国”多指诸侯政权。孟子说：“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

心》》接近今天“国家”构成的三要素。据《史记》记载：夏朝就有了货币交换；商朝的商业已经很发达。周公就允许商的遗民自由民到远方做买卖，想见自由民中有一部分人经营商业。“无商不通”（《史记·货殖列传》），商品流通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必然带来社会的开放。而交通的发达，又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扩大了诸侯国之间的开放。当时商品流通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南方可以购得北方的特产，北方可以购得南方的特产。荀子曾经指出：“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纁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荀子·王制》）商品流通的过程不可能是一种纯经济活动，它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传播，给人们观念以深刻的影响。商人们从列肆贩卖，囤积居奇，到“周游天下”，在进行“贯货行贾遍郡国”的远程贸易中，打破了地域之间相互隔绝的状态，也传递了政治、文化的信息。商品经济的发展沟通了各诸侯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沟通了政治、文化联系。在长途经商的风气影响下，政治、文化交流之风也随之盛行。诸子及“舌辩”之士上说下教，四处奔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启迪于商人的贸易活动。墨子说：“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徒，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以此信徒不可胜计，然而不为，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墨子·贵义》）他们从商人经营活动的刻苦、耐劳、不避艰险中，得到了从事政治活动、文化宣传的某种启示。可见战国时期侯国之间普遍出现“开放”的局面，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般来说，开放指的是与外部进行联系、交往和合作。包括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联系、交往和合作。我国古代社会的开放，是指侯国为了富国强兵，打开国门，或根据



需要以高官厚禄从其他侯国聘用人才；或大胆地移植其他侯国的管理制度；或不惜代价地从其他侯国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有的则走出国门，对先进、强盛的侯国进行考察，学习他们的经验，对照自己找出差距以急起直追，等等。比如，商朝所封的周侯，季历时逐渐强大起来，商王不得不承认季历做西方的霸主，号称西伯，对商构成极大的威胁。西伯为了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对内“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时以待士，士依此多归之”。（《史记·周本纪》）同时，打开国门，吸引、接待来访的诸侯国人，以扩大影响。《史记·周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个情节：“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西伯的“开放”措施，是他实现“王业”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也表现了他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信心。春秋时的吴国“通于中国”以后，公子季札使聘于鲁国期间，主动“请观周乐”，又历聘于齐、郑、卫、晋等国，将高度的中原文化带回吴国。

到了战国时代，兼并日烈。七雄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图强，无不积极进行改革；而改革往往又伴随社会开放而行。改革越深入，越需扩大开放。《史记·赵世家》就记述了这样一个事实：赵武灵王即位以后，于十五年春，“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山”，极目四望，感慨不已。对他的谋臣楼缓提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大问题，即改革祖宗传下来的军队的“衣服器械”，从“夷狄”之国引进“胡服骑射”。他郑重地说道：

我先王因事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